

# 修辞学论文集

XIUCIXUE LUNWEN-JI

1981

中国修辞学会会刊

# 修辞学论文集

XIUCINLE LUNWEN

【合集】

中国修辞学会会刊

# 目 录

|                       |                  |
|-----------------------|------------------|
| 代前言·····              | 中国修辞学会名誉会长张弓 (1) |
| 汉语修辞学的过去和现在·····      | 唐启运 (1)          |
| 试评修辞学理论研究·····        | 宗廷虎 (10)         |
| 修辞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      | 陆稼祥 (16)         |
| 汉语修辞学的对象、任务和范围·····   | 黎运汉、张维耿 (26)     |
| 苏联俄语修辞学研究的现状概述·····   | 李鸿敦 (34)         |
| 简论语法与修辞现象的互相转化·····   | 吴士文 (41)         |
| 形象思维和修辞·····          | 黄汉生 (48)         |
| 修辞的心理基础·····          | 王兴林 (53)         |
| 考察修辞现象不能硬套模式·····     | 刘焕辉 (56)         |
| 汉语修辞学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 戴 磊 (63)         |
| 略论同义结构·····           | 郑远汉 (68)         |
| 句式的选用及其环境·····        | 濮 侃 (73)         |
| 炼句要讲究逻辑·····          | 权树威 (78)         |
| 词语锤炼的几种方法·····        | 胡安良 (81)         |
| 谈广播稿中语音要素的运用·····     | 吴为章 (87)         |
| 论修辞方法·····            | 王德春 (94)         |
| 论象征·····              | 秦旭卿 (98)         |
| “通喻”刍议·····           | 谭德姿 (108)        |
| 谈一种新兴的修辞手法——迭现·····   | 张德明 (113)        |
| 谈“互文”·····            | 石云孙 (116)        |
| 汉字和修辞——试谈“析字”·····    | 邱 巨 (119)        |
| 回避“复出”——学习鲁迅手稿札记····· | 倪宝元 (124)        |

|                               |            |
|-------------------------------|------------|
| 鲁迅著作中的语言调整·····               | 欧阳复生 (129) |
| 试谈中学语文教材中鲁迅作品的修辞·····         | 陆文蔚 (141)  |
| 试谈朱自清散文的语言艺术·····             | 柴春华 (147)  |
| 协调语言音节的种种手段——叶圣陶修辞艺术学习札记····· | 朱泳嫫 (155)  |
| 老舍作品语言修辞例示·····               | 吴家珍 (163)  |
| 相声修辞初探·····                   | 李忠初 (167)  |
| 谚语修辞初探·····                   | 尚延令 (174)  |

## 问题讨论

|                             |           |
|-----------------------------|-----------|
| “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是修辞的要求吗? ····· | 李晋荃 (179) |
| 文风的阶级性问题质疑·····             | 张应德 (184) |

## 希望与建议

|                             |               |
|-----------------------------|---------------|
| 把修辞研究推向新阶段·····             | 王希杰 (185)     |
| 关于大学文科开展汉语修辞教学与研究的一些想法····· | 姚殿芳、潘兆明 (189) |

## 编者的话

## 代 前 言

中国修辞学会汇编修辞论文数十篇,讨论范围广泛,有关于修辞理论的,有词语锤炼、句式选择的,有同义手段的,有语体特征的,有作家作品语言艺术风格的,有修辞格的客观基础、发展方向的等等,各抒所见,集思广益,体现了百家争鸣的方针。

可喜可贺!热切希望通过论文的切磋,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推动修辞科学的日益繁荣昌盛,有贡献于“四化”建设。

中国修辞学会名誉会长 张 弓

## 汉语修辞学的过去和现在

华南师范学院 唐启运

### (一)

我国古代语言学有着优良的传统,古人对汉语修辞的研究,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许多世纪中,修辞学的研究资料是很丰富的,这是我国修辞学史上的一笔十分宝贵的遗产。我们应该对传统的修辞学进行总结和阐述,剔抉梳理,阐幽发微,使我们研究现代修辞学的时候能够有所借鉴。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我国就有了一些关于修辞的正确言论。例如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的“辞达”论就是很有影响的一种见解。孔子说:“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这个说法为修辞提出了一个基本要求,认为语言的运用要足以把思想感情表达出来。这一正确的看法,和对语言的表达功能和社会作用的认识很有关系。孔子认为“言以足志”,“不言谁言其志?”(《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就是说,语言是用来表达思想感情的,一个人如果不说话,谁也不能了解他的思想感情。这个认识很重要。因为既然语言是用来表达思想感情的,怎样确切地把思想感情表达出来以让别人正确地理解,就具有重要的社会作用了。所以孔子又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孔子认为措辞不明确,说话就不能顺理;说话不能顺理,事情就办不好。这样就把语言运用得好不好的修辞问题和事情能否办好这两方面的事情直接联系了起来。孔子关于“正名”的说法,有人只从政治伦理上“正名分”的角度去看,没有从语言上的措辞去理解。其实,“正名”有着一个比较广泛的含义,它既可用来指政治伦理的“正名分”,也可用来指语言运用上的确切措辞。这两方面是一致的。孔子正是把语言运用上确切的措辞作为政治伦理上“正名分”的实际表现的。因为语言是一种工具,不论哪一种思想,都要凭借语言这个工具来表

达；任何一种社会活动，也都要通过语言才能进行。所以可以认为，孔子“正名”的说法，主要就是如何使用固有的言辞来确切表达思想和由此而使社会的各种活动得以顺利进行。正因为运用语言有重要的社会作用，所以孔子要求运用语言要足以把思想感情确切地表达出来。

但是，因为孔子的“辞达”论，只是片断的言论，孔子没有对它作进一步的阐明，怎样才算辞达？人们还是不能获得具体的了解，所以后来对这个问题产生了种种不同的解释。司马光在《答孔文仲司户书》中说：“孔子曰：‘辞达而已矣’。明其足以通意，斯止矣，无事于华藻宏辩也。”认为能把意思明白地表达出来就是辞达，用不着华丽的词藻。苏轼在《答谢民师书》中说：“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认为言辞要真正反映客观事物，也要用文饰的言辞才算辞达。章学诚在《杂说丙》中说：“今人误解辞达之旨者，以谓文取理明而事白，其他又何求焉？不知文情未至，即其理其事之情亦未至也。譬之为调笑者，同述一言而闻者索然，或同述一言而闻者笑不能止，得其情也。……夫文生于情而文又能生情，以谓文人多事乎？不知使人由情而恍然于其事其理，则辞之于事理必如是而始可称谓达尔。”认为不能只讲理明和事白，还要讲文情，而且只有把文情表现出来，使人由情而明事理，才叫做辞达。方孝孺从“气”的角度加以解释，在《与舒君书》中说：“夫所谓达者，如决江河而注之海，不劳余力，顺流直趋，终焉万里；势之所触，裂山转石，襄陵荡壑，鼓之如雷霆，蒸之如烟云，登之如太空，攢之如绮毂，回旋曲折，抑扬喷伏，而不见艰难辛苦之态，必至于极而后止，此其所以为达也，而岂易哉！”认为“气昌”才叫做辞达。恽敬从言辞运用的特质加以解释，在《与纫之论文书》中说：“孔子曰：‘辞达而已矣’。孟子曰：‘谀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古之辞具在也，其无所蔽、所陷、所离、所穷四者，皆达者也；有所蔽、所陷、所离、所穷四者，皆不达也。”上面所举的关于什么是辞达的种种说法，虽然角度各有不同，但是立足点是共同的。这个立足点，就是要真正把思想感情明白地表达出来，那便是辞达。既然是明白无误地表达了思想感情，言辞少一点和言辞多一点，都是辞达；言辞简朴和言辞华丽，也都是辞达。这时候，朴实的言辞和华丽的言辞是统一的，是没有矛盾的。本来，孔子也並沒有反对言辞的美巧性。他也曾认为“情欲信，辞欲巧。”（《礼记·表记》）这个“巧”字，是巧妙的意思，指言辞用得和顺美巧。孔颖达在《礼记正义》中指出：“辞欲巧者，言君子言辞欲得和顺美巧。”美巧，就是有文采，讲修饰润色。在许多场合，运用语言也确实要讲文采。言辞没有文采，就不能很好地起到其应有的社会作用。所以孔子认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又说：“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这里有个历史故事。古书说，郑国攻伐陈国，郑国获得胜利。郑国向晋国献捷，求取晋国的认可。晋国人提了几个问题，郑国子产以美巧的言辞对所提的问题回答得很好，终于获得了晋国的认可。孔子很赞赏郑子产的美巧的言辞，认为要是没有那样美巧的言辞，就不能取得这样的功效。可见孔子並沒有反对言辞的美巧性。孔子一方面主张言辞要美巧，要求言辞要有文采，但是一方面反对“巧言”，说“巧言乱德。”（《论语·卫灵公》）说“巧言令色，鲜仁矣。”（《论语·学而》）这里“巧”字的意义，是指虚浮不实；“巧言”是指虚伪好听或虚浮不实的言辞，是消极性的言辞，它和前面所说的积极性的美巧的言辞有很大的差别。

到了汉代，修辞的研究有了发展。这个时期，对修辞的看法比前多了，一些论述也逐渐



趋于详细。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理论家王充关于修辞的一些见解就是很正确的。例如他主张运用语言要浅显通俗，要明白畅晓。他说：“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高士之文雅，言无不可晓，指无不可睹。观读之者，晓然若盲之开目，聆然若聋之通耳。”“夫笔著者，欲其易晓而难为，不贵难知而易造；口论务解分而可听，不务深遇而难睹。孟子相贤，以眸子明瞭者；察文，以义可晓。”（《自纪》）王充把通俗易懂、明白畅晓作为好文章的一种标准。好的文章，语言形式和思想内容是统一的。浅显通俗、明白畅晓的语言形式，才能使读者对思想内容更容易地理解，文章也因此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王充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说自己的文章是“直露其文，集以俗言”，“形露易观”。这些话就是说，用通俗的语言来表达思想感情，使人容易懂得。

王充的这种主张，对当时那种雕文饰辞、文义难懂的文风来说，是有针对性的。汉代的辞赋，过分雕琢辞句，堆砌奇字，脱离口语，“深覆典雅，指意难睹”，王充对这种文风是不满的，所以他加以反对。他批评说：“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定贤》）王充要求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外内表里，自相副称”，认为“有根株于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殼于外；文墨辞说，士之荣叶皮殼也。”（《超奇》）所以他反对那种脱离内容的崇尚“奇怪之语”、“虚妄之文”的文风。也因为这样，所以他主张用通俗明白的语言表现充实的思想内容。同当时那种“文必艰深”的文风理论是截然不同的。

王充主张文章的内容要充实，要有用，语言形式要通俗，要明白易晓，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王充也並不反对文采。不但不反对文采，而且很强调文采。他认为“物以文为表，人以文为基。”（《案书》）认为“龙鳞有文，于蛇为神；凤羽五色，于鸟为君；虎猛，毛蚺蛇；龟知，背负文：四者体不质，于物为圣贤。且夫山无林则为土山，地无毛则为泻土，人无文则为仆人。土山无麋鹿，泻土无五谷，人无文德不为圣贤。上天多文而后土多理，二气协和，圣贤稟受，法象本类，故多文采。”（《书解》）王充所主张的文采，是指形式和内容一致的文采。他认为“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超奇》）意奋于里，笔纵于表；思想内容充实，才高知深，用美丽的文辞来表现它，也是很合理的。显然，王充所主张的文采，同缺乏思想内容而“为美丽之观”的“调墨弄笔”是完全相反的。王充关于文采的见解，对刘勰有很大影响。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具体地阐明了内容和形式的密切关系，指出质文应该并重。刘勰说：“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鞶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情采》）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是相互依存的统一体，他认为古代圣贤的文章也是情采兼顾的：“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衔华而佩实。”（《徵圣》）所以理想的文章是内容和形式密切配合，既有充实的思想感情，又有得当的文采。刘勰对思想感情不充实和文采过多而表现出的舞笔弄文的弊病也是加以反对的。

魏晋南北朝以后，我国修辞学的研究园地更加广阔了。例如对于风格的问题，有了很多具体的论述，其中有不少卓见。魏朝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文章的不同体裁和文章的不同风格的关系问题，指出八类文章（奏、议、书、论、铭、诔、诗、赋）的四种风格（雅、理、实、丽），成为了我国文体和风格研究的先河。西晋陆机在《文赋》中对文章的体裁和风格的关系问题进一步作了具体说明。他论述十类文章的风格，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悽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淖皤而漓。”齐梁之间，杰出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在《文

《心雕龙》中更进一步地详细地论述了风格的问题。主要有几点：一、把风格归纳为八种，指出每种风格的特征。八种风格是：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所谓典雅，是指内容符合儒家学说，文辞比较庄重。所谓远奥，是指说理符合道家学说，文辞比较玄妙含蓄。所谓精约，就是分析精细，文辞简炼。所谓显附，就是说理磷晓，文辞质直。所谓繁缛，就是善于铺叙，比喻多，文辞华丽。所谓壮丽，就是议论高超，文辞豪迈不凡。所谓新奇，就是内容诡奇怪异，文辞力求奇巧。所谓轻靡，就是内容空泛浅薄，文辞浮华庸俗。在这八种风格中，新奇和轻靡是当时所表现的一种不良的文风，刘勰对这两种是不满意的。二、论述风格和作家的关系，认为作家的才、气、学、习的不同，决定了风格的不同。他说：“才有庸雋，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譟，文苑波诡者矣。故辞理庸雋，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体性》）在才、气、学、习四者中，刘勰固然很重视才、气，但是他也强调培养良好的风格，要依靠长期刻苦的学习。八种风格虽然变化无穷，多种多样，但是努力学习，可以陶冶而成。三、论述风格和文体的关系，认为不同的文章体裁有不同的文章风格。他在《定势》篇中概括地说：“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穷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宏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刘勰在《文心雕龙》的各篇中对文体前后说过有三十多类，这里所说的只是一种约举。每种体裁由于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的要求不同，形式不同的风格。例如赋的风格为什么是清丽的呢？他在《诠赋》篇中解释说：“原夫登高之旨，盖覩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乃赋之大体也。”四、论述风格和时代的关系，认为时代不同，文章的风格也有所不同。他说：“榘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辩，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澹。何则？兢今疏古，风末气衰也。”

#### （《通变》）

刘勰不仅对风格问题作了系统的具体的论述，而且对一些修辞手段也作了很好的说明。例如对于夸张这一手段，刘勰论述了它的作用，认为它是文学创作所必需的，在文学中是永远存在的，因为它可以产生巨大的艺术力量，可以把积聚蕴藏的东西表达得鲜明畅快，可以使读者的内心感动，可以使瞎子睁眼，聋子震惊。他又论述了运用夸张的原则，认为运用夸张要以事实为基础，要抓住事物的本质特点，要有节制而不过分，如果“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这些意见是很正确的。

唐朝，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这部杰出的史学理论著作中，对语言运用的问题也有一些很精辟的见解。他主张使用当时的语言叙事，反对模仿旧辞。认为“夫天地长久，风俗无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而作者皆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不其惑乎？”（《言语》）语言有古今之殊，使用当时的语言叙事，对客观事物可以达到比较自如而真实的反映，读者也可以比较真切地了解当时的社会面貌。刘知几又主张叙事的语言要力求简要，要以简要的语言表现丰富的内容，所以他认为“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叙事》）要做到“文约而事丰”，在语言运用上，就要去掉多馀的词句，反对“寻其冗句，摘其烦词，一行之间，必谬增数字；尺纸之内，恒虚费数行”的弊病。虽然刘知几是对史传文说的，但是对一般文章也是应该这样要求的。唐朝古文运动的创导者、杰出的古文家韩愈在语言运用问题上也说了一些具有卓识的意见。他大力提倡古文，反对骈文。在语言方面，第一，强调创



新,反对模拟。要求“唯陈言之务去”(《答李立翱书》),赞扬“词必已出”“不蹈袭前人一言一句”的文风(《樊绍述墓志铭》)第二,要求文辞要畅达。他说:“文从字顺各识职”。“文从字顺”是要朴质,“各识职”是切合情理。所以“文从字顺各识职”是语言运用的一种基本要求,符合这个要求,文章才可能达到恰当和畅达。六朝的文章,韩愈认为不能文从字顺各识职,所以说它们“杂乱而无章”。

上面所说的是举例的性质,但是由此可见,古代关于修辞的言论、见解和论述,有不少是很正确的、精辟的。但是,这些言论、见解和论述,一般是同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文章作法、诗话词话、语文笔记混在一起的。而且,这些言论、见解和论述,又多数是片断的、个别的。也就是说,在这些言论、见解和论述中,还没有把修辞作为独立的对象加以全面的规律性的阐明,所以作为修辞学,在从先秦至清末的这个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还是缺乏科学系统性的。

## (二)

修辞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二十世纪初的事情。1898年《马氏文通》的问世,标志我国语法学的建立,同时也给我国修辞学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自此以后,几十年间,研究修辞的著作很多,这些著作是我国研究现代修辞学发展史的重要的宝贵的资料。

在二十世纪头三十年中,语文学界是从各方面来探索修辞学的体系的。

第一,从语法的角度来研究修辞,把修辞和语法杂陈了。这种研究是在《马氏文通》的直接影响下进行的,把修辞看作是语法学所要研究的东西,又把语法看作是修辞学所要论述的对象,以致在语法的著作中研究修辞现象,在修辞学的著作中论述语法规律。例如1912年问世的《修辞学驾说》,全书四章,有两章是专谈语法的。第二章叫“动词法”,论述什么是内动词、外动词、受动词、助动词和它们的句法关系。第三章叫“虚字法”,论述介词、助词、状词、疑词、叹词的用法。其他两章和修辞有关,第一章叫“结构法”,谈“谋篇”、“造句”、“炼字”;第四章叫“整饰法”,谈“引喻”,“奇偶”、“摹写”,这些都是传统修辞学所涉及的修辞范围和修辞方式。这样的著作,对什么是修辞学的研究对象还不明确,只能说是一种混杂的研究,是把传统修辞学的一部分内容和语法的一部分规律混和起来加以研究的一种著作。

第二,一些修辞学著作仍然是回过头去向古代求法。古代修辞学缺乏独立的科学的系统性,所以这种向古求法的修辞学著作,也难免跟文学批评和文章作法混杂起来,例如马叙伦的《修辞九论》,就是对布置、贯串、简洁、明显、锻炼、气势、美丽、变化、音节等九项所作的论述。这本书对文章的篇章结构十分重视,一开始就论述谋篇方面如何“布置”和“贯串”,认为“造辞以谋篇居上,谋篇者规范一篇之局势也。局势不立,则撰义陈辞,莫就班部。”在“气势”和“美丽”的两论中谈的主要是古代所谈的风格问题。“明显”这一论主要是论文章的利病。全书论及修辞方式的地方很少。同《修辞九论》相类似的是郑奠的《中国修辞学研究法》,所研究的内容也是文章的气势、文章的利病、文章的繁简和文章的特点。修辞方式在这本著作中也是不占什么位置的。郑奠的研究,集录了大量的例证,比马氏的研究却充实得多。但是从研究方法看,他们基本上是因循旧说的。

第三,是向外国学习。“五四”运动前后,许多人都觉得学习外国文化是很必要的,所以修辞学的体系也就有人从外国吸收了进来。唐钺的《修辞格》就是依照纳斯菲的《高级英文

作文法》中的分类斟酌损益而写成的一本书。这确是一个新的体系，既不同于和语法相混的修辞学著作，也跟学习古代的修辞学著作有别。所以这一著作，使修辞学换了一个新的局面。修辞格无疑是修辞的一种重要方式，在修辞学中系统地研究这种重要的修辞方式，就使修辞学明显地表现出一种独有的性质，使修辞学得以明显地跟语法学、文学批评和文章作法分别开来而成为一门独具系统的学科。

唐钺的《修辞格》，把修辞格分为五类二十七种。五类就是根据比较、联想、想像、曲折、重复这五个方面所分出来的类别，这是根据修辞格的结构特点和人们的思想感受而作的分类。在所分的类别中，有些修辞格的界限不够清楚。如“反言”格，归入“比较”类；陈望道叫“倒反”，却归入“意境”类。唐钺的“反言”格，跟“婉辞”格、“微辞”格有共同的特点，都是有话不直说，但是把“反言”格归入“比较”类，把“婉辞”格、“微辞”格归入“曲折”类。有的修辞格，唐钺没有谈到，如只谈显比、隐比，没有谈借比。唐钺所说的修辞格，有的可以按照共同的特征加以合并，如婉辞和纤辞就可以合而为一。修辞格虽然是修辞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式，但是也只能是修辞学研究对象的一部分，不是修辞学研究对象的全部。同时，研究修辞格也应该根据中国的情况结合汉语的实际，全盘照搬外国的说法，难免削足适履。

第四，在本世纪头30年的这个时期中，在各方面探索的基础上，初步提出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修辞学体系。这就是王易的《修辞学》一类的著作所提出的体系。这类著作，注意到了理论上的说明，比较明确地解释了修辞学的对象，确定了修辞学的范围和论述了修辞学的内容。在这类著作中，认为修辞学所要研究的既包括积极修辞（修辞格），也包括消极修辞，文章的风格和文章的类别也应研究。但是，这类著作也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如修辞格到底怎样分类；从汉语的特点看，修辞格究竟有多少；篇章结构要不要研究；风格指的是什么，从理论上怎样阐明它和修辞的关系；文体分类的理论依据是什么以及如何分类，等等，这些问题都还没有给以详细的阐明，有待于以后进一步去研究。

### (三)

在头30年修辞学探索的基础上，30年代和40年代的修辞学作了进一步的比较全面的研究，这是汉语修辞学比较深入研究的一个时期。

这个时期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此书出版于1932年，为修辞学的领域揭开了新的一页。此书不但有丰富的材料，而且有系统的理论。在用例方面，也不再限于古代文言文，已经涉及了近代白话文和现代的作品。在研究修辞现象方面，继续采用了王易《修辞学》所分的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的说法，并且第一次对修辞格作了全面的概括，比较中肯地指出了修辞格运用的方法和原则。在论述文字的本身，也很有条理，畅达明晰。所以在理论方面和实践方面都比以前的修辞学著作有更大的意义。但是这一部著作没有包括篇章结构，风格和文体的论述也没有在这一部著作中占到应有的篇幅，材料有罗列之嫌，谈修辞现象时也忽视思想内容。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的优点和缺点对后来的许多修辞学著作都发生了影响。

一方面，有些修辞学著作的研究对象转到现代汉语方面来了，这样就不但科学地分别了古今语言的不同，而且就实用方面也使读者在进行写作时和鉴赏现代作品时得到了直接的指导。有些著作对修辞理论也作了较多的阐述。

另一方面,有些著作基本上是按照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的修辞格,只是换上了不同的例子。这类旧瓶装新酒的著作,除了那部分新例可作为参考资料以外,在科学体系上则是没有什么新的东西。这些著作也多是脱离思想内容来谈修辞现象,有为材料而材料的倾向。

在这个时期中,也有象上一时期唐钺的《修辞格》那样向外国学习的著作,如徐梗生的《修辞学教程》。唐钺是根据纳氏《高级英文作文法》所分的辞格,徐梗生则是根据日本五十岚力《新文章讲话》而把辞格分为八类36种。陈介白的《新著修辞学》则是根据了日本岛村抱月、五十岚力、佐佐政一这三家的修辞学著作而编成的,也是偏重于辞格研究,把辞格分为四类60种,繁杂得很。

在这个时期中,也有一部分著作不是以辞格为唯一的内容或重要的内容的,它们也谈篇章结构和用词造句。甚至有的著作以篇章结构和用词造句为主,把一些辞格分别放进里面作为一个细目来谈。这实际上是一种折衷,但是较偏重于传统的研究法。这种著作对作文的指导是较实用的。但是由于较强调了文章作法和语法规则,修辞方式的系统性在这些著作中显示不出来,所以仍然是一个很大的缺点。

在这个时期中,也有以古代汉语为研究对象的修辞著作,象杨树达的《中国修辞学》(1954年科学出版社出版时改名为《汉语文言修辞学》)这类书。这类著作所收的例证很丰富,对阅读古汉语很有帮助,但是体系流于锁碎,材料堆积,理论的说明很不够。

在这个时期中,也有深入研究一两个修辞方式的专门著作,象黎锦熙的《修辞学比兴篇》。黎锦熙把修辞方式分为四类25种,正如他自己所说:“这本比兴篇就是‘明法’的二十五小篇之一,若照这比例推算,这本比兴篇仅不过相当于全书的一百五十分之一。”他曾经准备编一部包括六部分的修辞学讲义,可惜的是这篇“比兴篇”专著出版以后,其他的就不再问世了。

总的说来,这个时期修辞学的研究是比上一时期较全面和深入了。但是,这个时期对于修辞理论的研究还是很不够的,修辞格分类的根据和如何归类,都还没有作到科学的说明。风格和文体在修辞学上到底占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也没有明确的阐述。也还可以看到,这个时期的修辞著作是罗列材料多,解释说明少;有的解释说明也欠明晰和通俗,对读者没有起到应有的指导作用,实用意义也不大。最后,这个时期的修辞著作,多数是忽视修辞的思想内容,孤立地分析语言形式,这不能不是一个严重的缺点。

#### (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50年代,党和政府对祖国语言的运用所给予的重视,促进了实用修辞学的发展,明确了修辞应该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注意到了文风的重要意义。

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社论明确地指出了语言的社会作用和正确地运用语言的重大的政治意义。社论说:“用正确的语言来表现思想,使思想为群众所正确掌握,才能产生正确的物质的力量。”正是因为这个道理,所以“正确地运用语言来表现思想,在今天,在共产党所领导的各项工作中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但是一些人使用语言是含糊的和混乱的,说话作文是缺乏条理的。针对这样的现象,所以社论号召说:“只有学会语法、修辞和逻辑,才能使思想成为有条理的和可以理解的东西。”

《人民日报》在发表这篇社论的第二天,就开始以半年的时间连续登载了吕叔湘、朱德

熙合著的《语法修辞讲话》。同时，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对所属机构及全国出版工作者发出了号召，要求积极响应《人民日报》6月6日社论的号召，努力学习语言，把《语法修辞讲话》当作经常的业务学习资料。

这样，就在全中国范围内逐渐掀起了一个学习语法修辞的新浪潮。

由于现实的原因和社会的需要，也由于修辞学工作者的努力，在五十年代，不少的修辞著作，是面向广大群众的，是有实用意义的。这和以前修辞学的研究有很大的不同。这个时期的研究改变了过去那种脱离广大群众的实际需要的不良的倾向，使广大群众不再发生一种错觉，以为修辞是什么玄妙和深奥的东西，使广大群众感觉到了学习修辞的必要和需要，而且对修辞学的学习发生了兴趣。

在这个时期中，结合思想内容来研究修辞现象已经逐渐被人们注意到了。1953年张璠一的《修辞概要》就已经说到：“要想学好修辞，一定得先在生活实践里丰富自己的思想。否则单靠修辞的帮助，写出来的文章尽管文理通顺、辞藻活泼，要是内容空空洞洞，就真的成了‘绣花枕头’了”。但是此书如何在用词造句和篇章结构的具体问题中结合思想内容谈得不多。1959年北京大学汉语教研组编的《现代汉语》中的《修辞》部分，结合思想内容论述修辞现象，提出了“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的原则。

在这个时期中，一般都较倾向于修辞学的较广的范围，即包括用词、造句、篇章结构、对修辞格、文体和风格等部分。但是对这几个部分的论述却有不同的侧重。

在这个时期中，修辞学著作注意到了罗列现象的偏向要纠正，所以对修辞现象多作解释，修辞方式运用原则也多加说明，尽力使读者减少因为繁杂的材料引起的迷惑。

在这个时期中，修辞学著作注意到了现代典范作品用例的选择，一方面增强了修辞学研究的思想性，一方面得以更好地引导读者去学习和鉴赏现代的典范作品。

重视所谓消极修辞的讨论和文病的评述也是这个时期研究修辞的一个特点。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中的修辞部分，许多就是所谓消极修辞。而且病句的评述比范句的引例还要多。北京大学汉语教研组编的《现代汉语》中的《修辞》部分在正面的论述之后也总是评论一下一些病句。这是修辞研究中把理论和实践进一步结合的一种表现。因为这样可以使读者不但知道怎样是对的，还可以知道怎样是不对的，这样就更有实用的意义了。

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时期对于修辞理论的研究还是很不够的。修辞学范围到底有多大，包括哪些内容，这些内容和其他的学科（如篇章结构之对于文章作法，风格和文体之对于文学理论）的关系，以及从此而引起的修辞学在这方面和文章作法以及文学理论怎样分工，修辞格分类的理论根据是什么，怎样分类，在修辞学著作中应该谈哪些格呢，等等，这些问题都还没有从理论上得到科学的说明。

关于文风。文风，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对文风问题作过许多指示。50年代，特别是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初期，对毛泽东同志关于文风指示的学习，维护了祖国语言的纯洁和健康，促进了优良的文风的发展，给修辞学的研究增添了新的气息。毛泽东同志的文风理论，早在1942年的《反对党八股》、《整顿党的作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1941年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等篇文章中作过深刻的论述。在1948年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和1949年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又有关于文风问题的指示。1955年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一些按语中对文风问题又有所阐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文化教育界在比较广泛的范围中对毛泽东同志的文风理论和指示不时地加以学习研究和运用贯彻，对抨击不良的文风，促进优良的文风，对正确使用祖国语言，维护祖国语言的纯洁和健

康，都发生了很大作用。1958年，毛泽东同志又把文风作为一个问题明确地提出来，指出文章要具有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这样的三种性质，后来人们把这三种性质简称为“三性”。1958年《新观察》第七期发表了郭沫若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三性”的论断所作的《关于文风问题答本刊记者问》的文章，对怎样才能使文章写得准确、鲜明、生动的问题作了很好的分析和阐明。自此以后，“三性”的理论在新闻界、文艺界、语文界发生了很大影响。二十年来，语文界在修辞著作中不少以“三性”的理论作为依据来论述修辞的目的和任务，认为修辞就是运用语言各种手段使文章具有“三性”的效果的一门学科。

在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前期的“十年浩劫”中，我国文化教育事业受到了极大的摧残，语言学、修辞学也受到严重的破坏，党的优良文风也受到严重的糟踏。在这个时期，帮八股的文风盛行，语言运用混乱，汉语的纯洁性和健康性受到损害。帮八股的文章和讲话，招摇撞骗，造谣撒谎，胡言乱语，脏言秽语，或者照搬照抄，陈词滥调，文字粗糙，千篇一律。受帮八股的恶劣文风的影响，一些同志写文章也沾染了不实事求是的作风。打倒“四人帮”以后，对帮八股的恶劣文风进行了批判，党的优良文风才逐渐得到了恢复和发扬。如何促进优良的文风进一步发展，还要做很多具体工作。

## (五)

综上所述，修辞学的研究，整个说来是很不够的，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需要明确。在这里，就几个问题择要谈一下。

一、应该加强修辞学理论的研究。修辞学研究工作进展不快，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对修辞学理论没有足够的研究。象一切学科一样，没有一个科学的明确的理论，一个学科的研究工作就缺乏了依据，少了指导，综观过去的修辞学著作，普遍罗列现象的多，真正分析说明的少，个别著作简直是贴标签，有的也只是换一些例子而已，没有多少个人的见解，更谈不上新鲜的看法。对学科原来已经存在的问题，很少进行深入的探讨，因循守旧，以己之昏昏，也就使人昏昏了。这样就连原来的水平也不容易保住。要突破，要创新，要有一个新成果，必须就修辞学的各个方面加强理论研究，迅速提高理论水平，对各个方面的问题都能给以科学的真正的阐明。

二、加强修辞手段的研究。修辞是如何有效地运用语言的各种手段的一种语言活动，语言包括语音、词汇、语法三要素，所以修辞就不能不是对语音、词汇、语法这三者提供的手段的综合运用。修辞和语音、词汇、语法，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修辞要善于利用语音的各种特点，善于利用词汇的各种现象，善于利用语法的各种格式。可以为修辞所利用的语音特点、词汇现象、语法格式，都是修辞系统的手段。作为另外一种比较定型的、比较独立的格式——修辞格，是修辞系统中很重要的一种手段。各种手段都是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根据不同的需要和不同的目的而被使用的，虽然使用的频率和效果有所不同，但都是方式、手段，不必要也不需要把它们分为积极的修辞手段和消极的修辞手段两大类。在固定的具体的场合，只能用被认为是消极的修辞手段，却不用被认为是积极的修辞手段，所谓积极的并非万能，所谓消极的也不是无能为力，两者本无截然分开标准，分开之后反而容易引起误解和产生误用，所以不必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

(下转第52页)

# 试评修辞学理论研究

复旦大学 宗廷虎

## 一、关于修辞学研究的对象、任务和范围

修辞学研究的对象、任务和范围是什么？这个问题，解放以来分歧较大，曾经在报刊上展开过两次比较集中的自发性讨论。一次在六十年代初，一次在近一、二年。争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是否都是修辞学研究的对象。

一种意见认为，修辞学研究的对象是修辞现象，如陈望道。他把修辞现象分为消极修辞现象和积极修辞现象两种。为使语言明白、通顺、平匀、稳密而采取的修辞手法称为消极修辞，在这过程中出现的修辞现象，称为消极修辞现象。为使语言生动形象而采取的手法称为积极修辞，在此过程中出现的修辞现象，称为积极修辞现象。这两种修辞现象都是修辞学研究的对象。

还有一种意见主张，修辞学的目的是“美化语言”，只有积极修辞现象，才是修辞学研究的对象。如有的人认为：“修辞就是修饰词句。”所谓“修饰”，即对词句进行形象、生动方面的美化。例如黎锦熙在为张弓的《现代汉语修辞学》所写的序言中说：“那么修辞学本身要独立说明的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就是各色各样的修辞方式了。”他这儿说的“修辞方式”，即是指辞格。

这些看法实际上认为，只有修辞格，才是修辞学的研究对象。这种把修辞学和修辞格划上等号的主张，体现在修辞书里，就是只谈修辞格。解放初出版的谭正璧的《修辞新例》，最近一、两年问世的某些修辞读物，都是用修辞格贯串全书的。

解放以来，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一直在进行。例如，周振甫在五十年代出版的《通俗修辞讲话》中指出，讲修辞只谈辞格是片面的。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了消极修辞手法比积极修辞手法更重要、更急需的观点。因为“我们运用语言，先要做到明白清楚、准确贴切，有条理，把自己的意思恰当地表达出来，这是首要的。”“我们要更其注意修辞的消极手法。”同时他又讲：“这样说，并不是说修辞的积极手法不重要”，不过有个轻重主次之分罢了。

这话说得很对。消极修辞是研究如何使写说能明白通顺地说明问题、准确妥贴地表述思想的。它是一种日常生活中用得最多的、基本的修辞手法。把写说修饰得美丽生动，这是第二位的要求，是在消极修辞的基础上进行的。我们很难设想，一篇连用词造句都不能通畅明白的文章，尽管在某几个地方运用了积极修辞手法，而能使整篇文章生动起来。从使用频率看，消极修辞远超过积极修辞。前者是一种在任何文体、各类文章中都能找得到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尤其在公文语体、科技语体中，更刻不可少。当然，积极手法也是重要的，尤其在文艺语体中用得较多。语言运用技巧上存在着两大分野，乃是客观存在。把其中一个方面



排除在语言研究之外,有很大的片面性,于研究非常不利。吕叔湘在《漫谈语法研究》一文中说:“那种认为修辞学主要是讲修辞格的想法恐怕是不妥的。”(《中国语文》1979年第1期)这话很对。

经过较长时间的讨论,绝大多数人的看法是,修辞学如果仅仅研究积极修辞,即只研究修辞格,那是十分片面的。例如郑远汉就说,只以修辞格为研究中心,“远不能概括和解决语言运用中的全部问题”,同时,这样做,“在研究方向和方法上有很大的局限性,有很多弊病。”(《关于修辞学的对象和任务》,《华中师院学报》,1980年第3期)许多人都认为,修辞学研究还应包括选词、炼句、篇章结构、风格等方面的问题。但是,认识并没有统一。既然还有人主张修辞学就是研究修辞格,那就说明争论应该继续下去。

第二,主题思想和题材的选择,是不是修辞学研究的范围。

一种意见主张:“主题的选择和主题的表达”,应“划入修辞学的研究范围”。“观点怎样统率材料,材料如何选择、剪裁,又如何组织起来,都是修辞学所要研究的内容。”(唐漱石:《学习毛主席著作,建立马克思主义修辞学》,《吉林大学学报》1960年第4期)

也有人认为:“在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上,修辞学存在着两种观点、两种体系的斗争。”提出要以毛主席的文风理论为指导,以三性(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为纲,建立“修辞学新体系”。(潘允中:《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建立修辞学新体系》,《中山大学学报》1961年第1期)

其实这种意见是从一九五九年开始流行的。这一年北大中文系编辑的《现代汉语》中册出版了。这本书在别的方面虽有成就,但却扩大了修辞学的研究范围,把文章的主题及材料的掌握和选择,也作为修辞学的研究对象加以论述。这种看法,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有一定影响。

另一种意见不同意把主题和题材的选择划入修辞学范围,也不同意研究修辞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文风的“三性”(准确、鲜明、生动)为纲。

吴哲夫在《哈尔滨师范学院学报》1963年第2期上发表的《汉语修辞学的对象和任务》一文中指出:修辞学和写作指导、作文法等类书不同。“写作指导”不能不研究如何提高思想认识、如何端正思想方法,更不能不谈如何选择主题。而修辞谈的是“语言技巧问题”,它管不到思想范围的事。至于文风,郭沫若在《关于文风问题答〈新观察〉记者问》一文中曾经指明:“文风问题,刚才已经讲到,不是单纯的语言问题,主要还是思想和思想方法的问题。”吴哲夫说:“很明显,研究什么学问,也脱离不开思想和思想方法,但不等于任何科学都要研究思想方法问题。”那种认为只有扩大修辞学研究的范围,把思想内容也列为修辞学研究的对象,才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这种看法显然是受极左思潮影响所致。

这种争论并未结束。张德明于1978年第4期《延边大学学报》上发表的《试谈修辞学和风格学、言语学》一文中说:“文风不仅仅是文章和讲话的作风问题,实质上是思想作风和政治路线问题,是表现党风和学风的”,要树立马克思主义文风,“不能仅仅靠修辞,还要涉及到内容和形式的好多方面”。这就证明,把文风与修辞等同起来是不对的。

我们很同意后一种观点。文风要涉及思想作风和政治路线,这就远远超出了修辞学的管辖范围,两者不能等同起来。另外,文风只管文章的作风,而修辞既管写文章的表达技巧,也要管说话的表达技巧。把文风和修辞两者混淆起来,既模糊了文风,也模糊了修辞学。

正如吴哲夫在文章中所指出的:“我们不主张用文风的‘三性’要求作为修辞学的纲领,是为了明确这门科学的对象和任务,以便更好地确定它的内容和体系;并不意味着研究修辞

可以忽视改进文风的‘三性’要求。因为研究修辞的目的之一，恰恰正是为了加速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风。”

六十年代初期，一些报刊上还发表了好几篇主张成立词章学、文章学、言辞学的文章。名称虽然不同，各人所述范围的大小也不一，但实际上大体指的是：主张加强对文章作法的研究，重视语言的运用。他们建议使文章作法成为一门学科，把修辞学、文体学、风格学、文法学都包括进去。对文章作法作深入研究，专门成立文章学，我们举双手赞成。文章学中要谈到修辞手法的运用，我们认为也有必要。但文章学决不等于修辞学，也不能因此而取消修辞学的独立性。文章学可以论述文章的主题、题材，可以探索文风，也可以论述语言运用的技巧。而修辞学着重从语言表达效果上去总结语言运用的规律，它探讨的范围不仅是书面语——文章，也应包括口语。它同文章学之类的学科，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

第三，篇章结构是否修辞学研究的范围。

一种意见认为，修辞学只研究到用词造句为止，篇章结构不是修辞学研究的对象。如前所述，持“修辞就是修饰词句”观点的同志就是这样主张的。有的人虽然不一定赞同修辞就是对词句的修饰，但也坚持修辞“总不能出乎语言词句之外”的看法。他们认为：“篇章结构等事情，……是作文法、文艺创作论所应当解答的。假使把篇章结构（起头、结尾等）放在修辞学中讨论，就会侵占文艺创作论、文章作法的领域，就会模糊修辞学语言科学的本质。”

（张弓：《现代汉语修辞学》）

在这种看法的影响下，许多修辞学书籍只谈选词、炼句、运用修辞方式等问题，于篇章组织方面的事只字不提，显然，他们是不把篇章结构列为修辞学研究对象的。

与上述看法相反，陈望道认为，修辞学应该研究篇章结构。早在《修辞学发凡》中，陈望道就提出篇章结构也是一种修辞现象，不过认为“格局无定”，没有进一步加以详细阐述。

张瓌一的《修辞概要》，则把篇章结构作为书中的一章来阐述。他说：“每篇文章各有自己的目的，各有自己的材料内容，这目的和材料内容，要求用某一种合适的形式表现出来。材料内容是各式各样的，因而表现的形式也是各式各样的。”这“表现的形式”就是篇章结构的技巧。接着，作者对这种技巧作了具体阐述。

著名作家叶圣陶曾写了一篇文章评论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刊《人民日报》1955年1月15日），认为，“只讲到句，没谈段落和篇章”，乃是该书缺点之一。指出：《讲话》“既然着重在讨论语言的使用，这就离不了思维的条理，而思维的条理常常在成段成篇的时候看出来”。修辞书如“要给读者更多的帮助，应该在下一句和上一句、后一段和前一段的关系上有所讨论。”这就是说，叶圣陶也是竭力主张修辞要研究篇章结构的。

吕叔湘、朱德熙的这本《讲话》，于1978年再版了。作者在《再版前言》中，把“只讲用词和造句，篇章段落完全没有触及”，作为第一个缺点来谈。这说明，吕、朱两位语言学家，也是同意叶圣陶的意见，主张修辞学要研究段落、篇章的。

目前，两种意见相持不下。在修辞书中，化较多笔墨论述篇章的，还比较少见。争论应该继续下去，双方似可进一步申述理由，并拿出事实来。

我们认为，修辞学既然是研究语言运用技巧的，如果只研究词和句的用法而置篇章修辞于不顾，则很不全面。例如衔接，是消极修辞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对语言的通顺流畅、文章的气势等，关系很大。假使只探讨词组和词组、分句和分句之间的衔接，不去管句子与句子、段落与段落之间的衔接，能取得好的修辞效果吗？“修辞学”决不只是“修词学”或“修句学”，这儿的“辞”指的是语辞，乃是包括全部语言的运用在内的。以上只是略举一

例。其实篇章修辞需要研究的方面很多，目前这方面的探讨还十分薄弱。

第四，语法与修辞合并，对修辞学研究是否有利。

解放初，从《语法修辞讲话》出版之后，一直流行一种将语法和修辞合并的主张。该书开创了把这两门学科合并起来研究的先例。其实，合并起来的结果是，修辞往往成为附庸。只是在讲完了语法规律之后，谈到语言运用时，才附带谈一点修辞。《语法修辞讲话》的六讲中，修辞只占一讲，这一讲仅仅谈了消极修辞的一部分内容，看不出修辞学的系统和体系；1973年出版的北大中文系编写的《语法修辞》，八章中也只有两章是讲修辞的，谈的问题也显得零碎。有的书虽然名为“语法修辞”，实际上谈的全是语法，修辞更是只挂了个空名，涉及得很少。可见，强行把两者合并，结果是重语法轻修辞；或者是使修辞成为书中的点缀、或者是让语法把修辞吞并掉，叫修辞无法立足。

另一种意见则反对语法修辞合并。郑远汉在《关于修辞学的对象和任务》一文中认为，修辞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单独进行深入地研究，“用杂糅式的办法”，于学科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我们同意后一种意见，从历史上看，我国修辞学之所以迟迟未能独立出来形成一门学科，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千百年来，一直把修辞学与文艺理论、文艺批评、文章作法、文字、训诂、语法等学科混杂在一起，修辞学的特性不容易显现出来，因此修辞学没有形成一个完整而科学的体系。到了八十年代的现在，科学的分工越来越细密，对每门学科更只有加深研究的必要，而没有混淆它们之间界限的理由。硬把它们纠缠在一起，除了给人以混沌不清的感觉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结果呢？其实，同修辞关系密切的学科，除了语法以外还有很多，例如逻辑、词汇、语音、文艺批评、文章作法等等。是否都有必要把它们同修辞捆绑在一起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第五，“平行的同义结构”，是不是修辞学研究的唯一主要对象。

1980年《南京大学学报》第2期上，发表了林兴仁的《汉语修辞学研究对象初探》。文章认为，“现有汉语修辞学著作的研究对象”都是“不明确”的。文章不同意陈望道等人提出的修辞学要以修辞现象为修辞学研究对象这一论点，认为这样说没有揭示“矛盾的特殊性”，作者的看法是：修辞学研究的对象是“汉语平行的同义结构和非平行的同义结构”。所谓“平行的同义结构”，即是一般人说的“同义结构”。作者认为语音、语法、词汇、语体都有同义结构。修辞学就是研究“平行的同义结构”的选择的。这种“平行的同义结构”，就是修辞学研究的唯一主要对象。凡是平行的同义结构包括不进去的内容，都划入“非平行的同义结构”一类。这种“非平行的同义结构”，乃是修辞学研究的次要对象。

郑远汉在《关于修辞学的对象和任务》一文中也认为：修辞学的“研究范围主要是两大部分：（1）利用语言手段和非语言手段构成的各种同义形式和表达方式。包括运用语言手段、词汇手段、语法手段、标点符号构成的各种同义形式和表达方式以及利用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规律构成的各种表达方式，等等。（2）各种言语风格。……研究各种同义形式和表达方式跟不同类型言语风格的适应性。”

同义结构是不是修辞学研究的唯一主要对象呢？不少人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同义结构是修辞现象的一种，过去对这一问题重视不够，是研究工作的薄弱环节，今后应该大大加强。但是，不能把它作为研究的唯一主要对象，因为同义结构不能概括所有的修辞现象，也不能说它是主要的修辞现象。象林兴仁文章那样，对传统修辞学关于修辞学对象和任务研究的劳绩全盘否定，那也是不恰当的。我们的研究应该而且必须建筑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